读史札记

奕劻与清帝逊位

周增光

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局势日益严峻，隆裕太后迭次召集王公大臣开御前会议商议对策。仅 1912 年 1 月 1 日到 2 月 12 日，不到两月间，清廷召开的亲贵会议就达 13 次。①在历次会议中，清廷亲贵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南京和谈，逊位共和，一派则支持君主制，主战。据各类记载，当时皇室权贵大部分倾向议和，惟小部分反对，而奕劻即“大部分”之一，且力主清帝逊位。《辛壬春秋》称，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贝子溥伦附和隆裕太后，主张实行共和。溥伦甚至认为与其召集国会议决共和，不如自行禅让，对皇室更有益。在近支王公中只有恭王溥伟、镇国公载泽、贝勒载涛谏阻。②另据莫理循的书信，在清廷颁布退位诏书以前，袁世凯曾派人拜见各位亲王，试图先争取皇室诸亲王的同意。蔡廷幹被派往拜见载洵和其他一些显贵。载洵对退位诏书欣然表示同意，只有肃亲王善耆和贝勒毓朗提出反对。③环顾清末历次亲贵会议，主和派、主战派相互争辩，会议结论时有起伏，奕劻的表现也随着会议的起伏有所变化，然而他力主清帝逊位的主张却是始终如一的。

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披露，载泽经常在载沣府邸建议扳倒奕劻，并称不如此，“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④而溥仪在奕劻死后，坚持赐予恶谥，称“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梁鼎芬为此在其侍讲日记里称：宣统九年正月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已而谥之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⑤恽毓鼎在其日记中论及奕劻，亦狠狠地说“奕劻之肉其足食乎？”⑥可见在清朝遗老眼中，奕劻就是断送清朝二百年基业的大罪臣。

然而，在奕劻退出政治舞台后，他却被民国一些官员誉为“首造共和”的亲贵。如 1912 年 9 月 5 日，赵尔巽在劝告东三省各界不要受宗社党煽惑的演讲时称，“亲贵中首领庆亲王，即是首先赞同共和的人。”⑦这无疑把奕劻抬高到首赞共和的地位。

综而言之，上述两种评论皆有失偏颇。考察奕劻在清末的表现，可以发现他的确力主清帝逊位，但并非简单地“断送大清”或“首赞共和”。

一、清末历次亲贵会议

（一）两方争锋，议无所决

1911 年 12 月 28 日，隆裕太后召见全体国务大臣及奕劻、载沣、善耆三王，载洵、载涛两贝勒，溥伦、载泽、袁世凯，颁布懿旨，召集国会商议君主立宪及共和政体。⑧时任内阁承宣使的许宝蘅和暂署度支部大臣的绍英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此次召见的情形，据他们的

[收稿日期] 2012－05－10
[作者简介] 周增光（1986—），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1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记载可知，此时清廷权贵们对局势已是束手无策。隆裕太后召见庆亲王等近支王公，询问意见，而他们却推说没有主意，需询问国务大臣等人。如此，隆裕太后只能将所有事情托付给国务大臣，称“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隆裕太后向诸臣称“只要天下平安就好”[⑨]，对事态处理结果的要求低至只求和平。王公们束手无策，总理大臣袁世凯却称虽然政体应坚持君主立宪，但是革命党不肯承认，决战无饷，外国不肯借款，并宣称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皇室安危大计应向皇族近支王公垂询，将问题又推到近支王公手中。隆裕太后又召集王公再次商议，遂定下召集国会商议政体之议。[⑩]清室一度将袁世凯视为挽救危局之关键，袁世凯此时却表现出无意插手“皇室安危大计”，隆裕太后只能迭次召集近支王公商议解决之道。

1912年1月17日，隆裕太后又召开御前会议。关于此次亲贵会议的记载，现存有几个版本。

版本一乃俄国公使之记载。奕劻在此次会议中主张有条件退位，而蒙古王公反对。据俄国驻北京代理公使世清致俄外务大臣沙查诺夫的电报，1月17日隆裕举行御前会议，其中有7名皇室亲贵与7名蒙古王公参加。庆亲王在此次会议中指出清廷经费和军需匮乏，他坚决主张在革命军答应保护皇族动产和不动产，保护宗庙，妥修德宗崇陵等条件下清帝退位。然而，蒙古王公提出异议，并认为革命军的保证不可信。于是，会议最后没有达成决议。[⑪]恽毓鼎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没有如此详细，大致内容也是奕劻力主退位，溥伦附和之，后因蒙古王公不同意而散会。但是他记述的会议时间是1月16日。[⑫]

版本二即莫理循之记载。1912年1月18日，莫理循收到蔡廷干的信函，蔡廷干称满族和蒙古族的王公们在1月17日的会面中缄口不语，只有一个蒙古人即那王无拘束地发了言，他是主战的。[⑬]

版本三为许宝蘅之记录。因会议当天许宝蘅生病未到公署，故而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会议情形当是打听到的。许宝蘅在十二月初一日（1月19日）的日记中称，廿八日（1月16日）国务大臣与亲贵庆、醇诸王会议，有人议请后、帝逊位，于天津另组织统一临时政府，民军政府亦同时取消，因为蒙古王公反对甚力，未曾决议。[⑭]

版本四乃溥伟所亲历。溥伟在其《逊国御前会议日记》中记称：十一月二十九日（1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中，只有溥伟反对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提出设临时政府于天津的建议。溥伟在此会议中主战，认为“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驳斥了梁士诒所称汉阳虽胜，但北方无饷无械以及胡惟德所举之外国不赞成开战的理由。奕劻则说“议事不可争执，况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于是群臣和之。[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对1月17日清廷御前会议的描述与溥伟大致相同，即：袁世凯称疾不至，赵秉钧、梁士诒等主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南京开议，而恭亲王溥伟及良弼等力持不可。[⑯]《中华民国大事日志》说法大体相同，不过指出“载洵、溥伦、奕劻咸认为保全皇室舍共和外空无善策。”[⑰]这次会议最终无果而散。

上述版本所述1月17日之亲贵会议的基本内容、会议结果是统一的——此次清廷亲贵就逊位等问题的商议，因个别亲贵的反对而议无所决。需要指出的是，各版本对奕劻在此次会议中的描述有所出入：奕劻在这些描述中或是坚持有条件退位、或是缄默不语、或是把决定权推给隆裕；不过在出入中亦有一致，即奕劻不是主战的。这两次亲贵会议因存在主战、主和两方意见，最终议无所决。

（二）主战派短暂占上风

经过两轮亲贵会议仍议无所决，于是，隆裕太后在1月19日再次召集亲贵会议。关于此次亲贵会议亦有不同说法。

一种说法是：奕劻被迫放弃让清帝逊位的主张，转而拥护君主立宪。俄国代理公使世清在一份电报中称，禁卫军军官代表曾去见庆亲王，并以死相威胁，迫使庆亲王在1月19日御前会议上放弃声明，主张君主立宪。[⑱]1912年1月19日，水野幸吉在致莫理循的函件中也称“庆亲王出乎意料地突然改变了态度，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变得拥护君主立宪。这显然是因为昨天晚上禁卫军代表对亲王殿下进行了恫吓性的访问。”[19]许宝蘅在其日记中也称1月19日的会议，庆亲王“亦不敢主张”，“前议仍未决定”。[20]奕劻受到禁卫军代表的威胁，乃不敢主张，暂时放弃清帝逊位，主张君主立宪的说法，主要流传在俄、日两国驻京人物中。这极有可能是主战派代表去会见奕劻，并借此来说服外国势力支持清室。毕竟在此时，列强的态度中日本表示想进行干预，俄国反对任何干涉[21]，这两种态度对主战派来说都有可乘之机。奕劻本人也的确不主张民主共和。在丁未政潮中曾助他一臂之力的恽毓鼎甚至认为奕劻对宣统朝的新政都持否定态度，称三年新政的危害“即当权大老亦未尝不知之”，只是“大老知而不言”[22]。

另一种说法则是：奕劻没有参与此次会议，溥伟等主战派主导了这次会议。溥伟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被隆裕太后召见参加十二月初一日御前会议的有：醇王、溥伟、睿王、肃王、庄王、载润、载涛、毓朗、载泽、那彦图、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未列奕劻之名。隆裕太后询问诸亲贵到底是君主立宪好还是共和好，众亲贵都说“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23]在此次会议中，溥伟、那彦图、善耆都表示主战。而隆裕在向溥伟等人称，她并非主张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的”。隆裕还向溥伟说，让奕劻求外国人。奕劻则称外国人认为革命党是要政治改良才用兵，除非摄政王退位，外国人才帮忙。溥伟以载沣退政而外国仍未助清为由，说奕劻欺罔。那彦图也叫隆裕不再相信奕劻。《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则记载在18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奕劻未至。不过19日的会议，奕劻参加，主要是“商退位事”，会后奕劻还与载沣访袁世凯续议。[24]

不管哪种说法，皆知在此次亲贵会议中，主战派占据了上风。1月22日，隆裕太后召集亲贵大臣等入对，仍无决定办法，遂议定等待国会决定国体。[25]据《中华民国大事日志》，1月24日清廷再开御前会议，铁良主张解散袁内阁，以赵尔巽为总理，自主军务，令荫昌督战，以兵力解决之。[26]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在所有主战派占上风的御前会议中，奕劻、袁世凯均告假未到会[27]。事实上，在当时整个北京城，告假躲避现实的官员不胜枚举。莫理循在致柔克义的函件中称“几乎每个内阁大臣和副大臣或者告了病假，或者以这样那样的借口要求准假。”[28]

（三）“人心倾向共和，不若逊位全终”

在主战派占上风的亲贵会议召开后不久，1912年1月26日，坚决反对逊位的权贵良弼被革命党人炸伤（后死），主战的清廷亲贵“至此皆胆落，纷纷离京走天津、青岛及大连。”[29]紧接着，1月27日，段祺瑞领衔各军统领四十七人电奏要求共和。在2月5日，段祺瑞等又致电清内阁，斥责阻挠共和的王公，称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之剖陈利害。[30]

情势急转，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1月29日的御前会议，众位王公均表示主和，不再反对共和，载沣将所有重要问题，委任袁世凯办理。[31]在30日的御前会议上，隆裕太后召见奕劻、载沣，“皆以人心倾向共和，不若逊位全终”，[32]于是拟定退位。随后在2月2日、3日、8日、11日隆裕叠次召见近支王公、蒙古王公和国务大臣等商谈。商谈的主要内容是商酌优待皇室的条件。后南方参议院亦有所妥协，最终达成清室优待条件八款、皇族待遇条件四款、满蒙回藏待遇条件七款。其内容对清室、清王公甚为优待。清皇帝辞位后，尊号仍存，中华民国待之以各外国君主之礼，每年由中华民国拨发岁用四百万两，新币为四百万元，还可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中华民国负责光绪帝崇陵未完工程，并特别保护清室私产。清室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对奕劻等皇族而言，优待条件为：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其与国民同等其私产，一体保护。免其当兵之义务。

这些条件“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可”。[33]于是，辛亥十二月廿五日（1912 年 2 月 12 日）隆裕太后即颁布懿旨三道，宣布清帝逊位，成立共和立宪国体。[34]

身历清末亲贵御前会议的载润称，奕劻极力渲染革命党军队力量之强大，清廷无力抵挡，最终影响隆裕太后决定下诏退位，支持共和。据载润的回忆，奕劻内阁辞职后，袁世凯内阁成立，将与革命军议和。奕劻就家居托病不出，载沣多次派王公、贝勒至其家敦请，才勉强进内应隆裕之召对。而他进内时即对大众声言“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到等候召对的地方，奕劻又复申前言“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与敌。”当时蒙古王公那彦图闻而嘲笑之说“数分钟内，革命党军队又增加了一万人之众，何其如此之速耶!”但经奕劻如此一说，隆裕遂表示倾向议和，即下共和诏。[35]由此可见，奕劻的主张对清廷的最终决议是有重要作用的。

二、奕劻力主清帝逊位的动因

在奕劻退出政治舞台后，他被民国一些官员誉为“首赞共和”的亲贵。但奕劻个人并不主张共和，他在 1911 年 12 月 24 日会见英国公使朱尔典时还声称共和制并不会使中国强盛。[36]那他为何仍力主清帝逊位呢?

（一）受贿并非主因

庄练认为奕劻贪财，袁世凯得以用财利玩弄他。[37]溥仪也认为奕劻是收了袁世凯的钱，劝隆裕退位。载涛则说“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38]溥佳则在《清宫回忆》中称袁世凯贿赂奕劻与张兰德各 300 万两银子，让他们向隆裕太后施加影响和压力。[39]上述观点皆认为，奕劻收受贿赂、听命于袁世凯成为力主清帝逊位的主因。然而，通过梳理当时的各种记录，可知被袁世凯贿赂并非奕劻力主清帝逊位的主因。

奕劻的确贪墨好货，但他收受贿赂后并非就一定满足行贿者。如盛宣怀在 1907 年清末新设行政机构时，托心腹陶湘在北京上下打点，重点对象便是奕劻。虽然陶湘称“邸堂于尊处甚浃洽”[40]，奕劻也收受了盛宣怀借他生日之机送来的 2 万元日本金币，但对盛宣怀所求邮传部尚书一职却并未应允。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载，广东有个叫周荣曜的人，从关吏起家，私产有数百万。岑春煊曾“折简招至署中责报效”，但此人不应，反而“私辇金入都，求通奕劻之门”，后得简四品京卿，出使比利时。岑春煊怒而弹劾他私吞关税，最后周氏出逃香港，家产被没收。胡思敬称“奕劻熟视，莫敢出一辞救也。”[41]与其说奕劻不敢招惹岑春煊，不如说是在不触及自己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奕劻不会为了行贿者冒险。袁世凯在贿赂奕劻上也是下足功夫，据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记载，徐世昌曾说庆王府的婚丧嫁娶等事俱由袁世凯的直隶总督府开销。载涛则直指奕劻是“袁世凯拿金钱喂饱了”[42]。但是，载沣在清末排斥袁世凯时，奕劻也没有为袁世凯说过好话。据袁世凯的幕僚王锡彤记载，当时载沣本意不止将袁世凯罢官，“幸张、鹿两公百方调解，始得完全回里”[43]，丝毫未提及奕劻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另载涛亦称奕劻在载沣等人欲杀袁世凯时，仅模棱其词地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44]。

由上述案例可知，奕劻并非收受贿赂就一定满足行贿者意愿，他与行贿者的关系表现出来更多是政治上的互利之交，是建立在相互得利、政治互保的基础上，故在两人同时获利时，两人呈现出合作无间之态，不能同时得利，奕劻则选择自保优先。仔细翻检史料亦可看出，奕劻力主清帝逊位不是因为受了袁世凯的贿赂，而是在环视列强态度、国内舆情、清廷自身力量后，出于最大化保护自身利益考虑而做出的举措。

（二）外国势力的态度

据《盛京时报》九月初四日（10 月 25 日）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外交团领袖公使朱尔典就到外务部宣称各国决定不干预中国乱事。[45]十一月十二日（12 月 31 日）又有报道，奕劻照会外国公使，希望列强能拥护保存清廷，而“惟某国答复极为冷淡，且述今日之中国不必以君主政体为是云云。”[46]报章的报道大致表明了外国公使的态度，这从列强的外交档案中亦可看出。

1911 年 12 月 24 日，奕劻偕袁世凯与英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使朱尔典会谈，希望借此次会谈了解英国公使对解决清廷危机的看法，并期望能得到列强的帮助。据当时的会谈记录，会谈初始，奕劻即让英使朱尔典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对清廷的建议。英使朱尔典建议，将国体问题提交国民会议讨论，以构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基础。[47]奕劻随即表示担心革命党人连这个建议都不接受，并询问英使，倘若谈判破裂，外国势力是否会有所干涉。朱尔典答道，没有英王陛下政府的指示，他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他个人认为，倘若共和派拒绝听从调停，意味着只能用武力对南方诸省实行强制干涉。但朱尔典同时又认为不会有列强采取如此步骤。

朱尔典的回答使奕劻明白，借助列强武力干涉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转向说，清廷由于财政困难，英使所建议的三个月期限非常难捱。他询问英使，如果清廷接受英使的建议，能否得到外国的金融援助。朱尔典答道，延期将提供一个使党派狂热冷却的机会，对清政府事业不会有所危害。至于外国援助问题，他建议奕劻听一听其他外国代表的看法；他只能说他本人赞成国民会议的建议，但如果庆亲王希望了解英王陛下政府对此事的观点，他愿代为询问。[48]这样的答复无疑是婉拒向清廷提供财政援助。

奕劻在对列强的探访中得知列强无意维护清廷。正如法国外交部长致法国驻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和华盛顿的大使的电报中所指出的，当时六大列强除了日本表示想进行干预、德国表示可以给清廷提供军火支持外，其他国家则表示无意介入：法国保持中立，观望中国南北方谈判的结果；英国则倾向共和，但不会介入；俄国反对任何干涉。不管列强的反应如何，他们都“拒绝对清皇朝的金钱上的任何支持”。[49]而到了1912年1月23日，英、法、俄、日四国公使则众口一词，俱赞成清帝退位。[50]

此外，1912年1月13日，奕劻还接到上海洋商团的七条建议。[51]其建议的核心是设立一个顺应大多数国民愿望，以共和为目的的临时政府，建议奕劻、载沣迅速将上海洋商会的意见转致宫廷、皇族之间，设法召集国会决定政体。

综上所述，通过与外国公使的会谈、获取外国商团的电报，奕劻探询出外国势力无意帮助清廷维护帝制，相反，他们谴责清廷，倾向共和。

（三）国内舆情所逼迫

截至1911年12月末，响应辛亥革命的省、地区有：湖南、陕西、九江、南昌、陕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镇江、南京、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重庆、成都。[52]时任南方谈判总代表的伍廷芳函致奕劻，称除非清帝逊位，赞同共和，否则在大江南北相继独立，清廷“土崩瓦解之时”，“舍此别无良策”。[53]1911年12月21日后，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也叠次来电称若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54]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月中旬后连续有人致电奕劻劝其支持共和：1月13日袁树勋、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致电载沣、溥伟、奕劻、世铎、载洵、载涛、溥伦、载泽等，请早定共和；1月15日廖宇春、靳云鹏访赵秉钧、杨度，请转劝奕劻等人赞同共和；驻外各使节陆征祥等也电请清帝退位；1月19日清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奏请人心已去，君王专制，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1月28日，山西全省文武官员又电奏请清帝逊位。[55]

不仅各方舆论、清廷的和谈代表、驻外使节、国务大臣建议改行共和，1月26日，段祺瑞亦领衔与各军都统电奏要求清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56]至此，清廷赖以作战的军队也建议改行共和。清廷此时迎战革命军的希望愈加渺茫——军费供应不上，列强明确不提供贷款，清廷本身的收入因各省相继独立而受到影响；国内舆情集体呼吁共和，连军队也要求共和。《梦蕉亭杂记》在描述清末的困境时称：“（袁世凯）嗣复授意前驱各将领，联衔力请逊位。沪上就居某督等和之；商界各巨子亦和之；英国公使某君，亦复为声援。”[57]虽然奕劻不赞成共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已无可奈何。正如其子载振对友人感叹“数年新政实失民心，无怪人心之去也。”[58]虽然他们对清朝大失民心的原因总结得或许不对，但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他们对清朝大失民心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59]

（四）自身利益驱使

当时，清廷处于开战无饷的状态，外国势力又拒绝贷款，亲贵大臣们的捐输成了重要的倚仗。[60]绍英在辛亥末年曾暂署度支大臣，对当时诸王公捐输情况甚为了解。据《绍英日记》，奕劻并非没有“捐输”。在辛亥十一月初七日（1911 年 12 月 26 日），奕劻约见绍英，令人于初九日（12 月 28 日）到王府取银十万两。[61]十七日（1912 年 1 月 5 日），奕劻又令绍英于十九日（1 月 7 日）派人到府邸领银五万两购买债券[62]。这笔钱为数不能算少[63]。可是奕劻因贪污所得的财富在清末王公中首屈一指，呼吁捐饷的矛头便直指向他，如郑孝胥在日记中指出“宫中存款已尽出，约九百万两，可支至十二月初旬耳。亲贵私蓄二千九百万，皆不肯借作国债，惟庆邸出十万而已。虽谓亲贵灭清可也。”[64]虽然捐输了钱财，只要亲贵们没有“毁家纾难”仍会饱受舆论指责，[65]而奕劻全无为清室捐献全部财产之意愿。

1 月 1 日，袁世凯告英公使朱尔典，唐绍仪辞职，军人请亲贵捐款续战。1 月 13 日，张勋电奕劻、载沣、世铎、溥伟、善耆、载洵、载涛、载泽、载振请凑集银两数千万，以应军需。[66]袁世凯、冯国璋也表示，如果有半年之饷，“以此军平乱党而有余。”[67]虽然军方急切呼吁，但是辛亥十一月二十六日（1912 年 1 月 14 日）暂署度支部大臣绍英还是无奈地禀告袁世凯“查明亲贵大臣在各银行并无存款”。[68]银行无存款并非因为奕劻等亲贵大臣们全数输捐，他们将大部分财产转移了。恽毓鼎在日记中称“众亲贵竞向银行票号提取现银，辇存外国银行，且有倒贴子金以求其收纳者。”其中“庆王最多，二百四十万”[69]。朱尔典在致坎贝尔的函件中称“庆亲王忙着将他的珍物兑换成金条，以便逃亡时携带”。[70]秉政多年，奕劻贪冒受贿积财无数，以至于当他从大清银行提款 25 万两白银后，北京爆发了金融恐慌性危机。[71]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指出，正是庆亲王、摄政王、那桐等亲贵大臣的大量提款导致清政府银行处境艰难。可见并非奕劻，其他清王公都不愿意将所有财产都捐献出来。对此现象，袁世凯又借机操纵政局，称“欲战则兵少饷绌，欲和则君主立宪宗旨难保，惟有辞职请上另简贤员办理”[72]。

在北军军方催饷、呼吁王公贵族们慷慨解囊的同时，南军适时提出优待清皇室、皇族的条件。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于 1 月 20 日向袁世凯提出优待条件[73]：除了维护皇室的尊号、宗庙等外，中华民国甚至“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逊清皇室；对清廷的王公贵族，民国政府仍维护其爵位，保护其私产。

一方面，奕劻不愿意“毁家纾难”；另一方面，正如在清末清廷御前会议中，隆裕对溥伟所言“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74]奕劻更害怕开战失败，连南方革命军政府许诺的优待条件都没有了。故而他一意主张清帝逊位自保。

1912 年 2 月 15 日南京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改建中华民国。曾任奕劻部属的丁士源于同日到其退隐的天津。第二日，奕劻即命人来邀丁氏面谈。丁士源将面谈情况描述如下：

及见庆邸，遂问丁曰：汝看慰庭竟如此而行，彼能长久否？丁曰：彼决不能长久。因中国数千年来，矜孤恤寡，悬为天经地义。人人皆知。彼之所以，非但有负两宫知遇之隆，且有负资政院全体推诚之厚，更无以对全国满、汉、蒙、回、藏四百余兆人民。想即彼之子弟至亲之中，亦有不以为然者。如其堂弟袁世廉，及其次子克文，亦均以为非。故不出五六年，夫已氏必趋自杀之途。且京、津两地前线退归之兵，亦均愤懑不平，蠢蠢思动，不久当有乱事。即民军方面，对袁亦颇有不以为然者。请王爷善保千金之躯，静观以待。况王爷三月来所作所为，诚如古训所言，投骨于地，众犬争食者乎。王大笑，并赠丁自画山水扇子一柄。丁遂辞出，归日本租界寿街自寓。[75]

从丁氏的记载可见，奕劻并非站在袁世凯之盟友之角度看待清帝逊位，他并非赞同共和，对丁氏做出袁世凯的举动“决不能长久”的判断是认同的。同时奕劻对丁氏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奕劻迫于各方压力的所作所为归纳为“投骨于地，众犬争食”，很是激赏，不仅“大笑”还馈赠物品以示赞同。综观奕劻在历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次亲贵会议上的表现，他都是主和，力劝清帝退位。以往研究引溥仪等人的记载，指称奕劻是袁世凯的傀儡，受其贿赂，主张清帝逊位，断送了大清。然而他是否是因袁世凯贿赂而力主清帝逊位，尚待深究。通过与外国公使的会谈，奕劻得知外国势力无意维护清廷统治，而共和更是国内舆情所向，不仅革命党人呼吁，连清廷的议和代表、军队都有此呼声。在这种情势下，奕劻主张清帝逊位实乃无奈之举。除了顺应大势所趋外，革命军政府最后给出的皇室、皇族优待条件，尤其是保护王公贵族的爵位与财产等承诺，又满足了奕劻自身利益的需要。所以，可见奕劻是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才做出主张清帝逊位的抉择。

---

①此数字乃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79 年) 统计得出。

②尚秉和 《辛壬春秋》，第二十七，北京政府成立记，中国书店 2010 年版，第 166—167 页。

③莫理循、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上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17 页。

④⑤溥仪 《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 页; 第 62—63 页。

⑥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 《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册，第 560 页。

⑦章开沅等编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3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0 页。

⑧那桐著，北京市档案馆编 《那桐日记》，下册，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06 页。

⑨许宝蘅 《许宝蘅日记》，第 1 册，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386 页。

⑩绍英 《辛亥年日记》，《绍英日记》，第 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第 265—267 页。

⑪陈春华等编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 有关中国部分 1911.5—1912.5》，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56 页。

⑫恽毓鼎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2 册，第 571 页。

⑬《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 838 页。

⑭《许宝蘅日记》，第 1 册，第 390 页。

⑮溥伟 《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3 期，第 172 页。

⑯郭廷以编著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发行，1979 年 (中华民国六十八年七月) 初版，第 10 页。

⑰刘绍唐主编 《中华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 页。

⑱《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第 267 页。

⑲《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 839 页。

⑳《许宝蘅日记》，第 1 册，第 390 页。

㉑《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7 卷，第 249 页。

㉒《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2 册，第 555 页。

㉓《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第 172 页。

㉔《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11 页。

㉕《许宝蘅日记》，第 1 册，第 390 页。

㉖《中华民国大事日志》，第 5 页。

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13 页。

㉘《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 844 页。

㉙㉚《中华民国大事日志》，第 5 页; 第 7 页。

㉛《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16 页。

㉜《中华民国大事日志》，第 6 页。

㉝《许宝蘅日记》，第 1 册，第 393 页。

㉞《那桐日记》，下册，第 709 页。

㉟载润 《有关奕劻的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65—466 页。

㊱奕劻在此次会见中称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他，都不相信共和制能在中国产生一个强固的政府。”见于《朱尔典爵士与庆亲王袁世凯会谈记录》，载《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8 卷，第 176 页。

㊲庄练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 1988 年版，在照片 2 “庆亲王奕劻”下的评价。

㊳载涛 《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0 页。

㊴溥佳 《清宫回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 23 页。

㊵陶湘致盛宣怀 “要事十六纸”，载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 《辛亥革命前后: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 页。

㊶胡思敬 “袁岑气焰”，载《国闻备乘》，卷一，上海书店 1997 年版，第 14 页。

㊷《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 79 页。

㊸王锡彤 《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2 页。然而，张之洞搭救袁世凯也许并非出于情谊深厚。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洹上私乘》中称: “先公亦觉之洞之相倾陷，累思乞休，乃以顾命治丧之臣不可遽去，而百日未终，罢官之诏下矣。”可见张、袁二人交谊一般，袁氏甚至认为张之洞在政治上陷害自己。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㊹《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 80 页。
㊺《外交团对于鄂乱之近况》，载辛亥九月初四日（1911 年 10 月 25 日）《盛京时报》。
㊻《表同情于君主政体者尠》，载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 年 12 月 31 日）《盛京时报》。
㊼这个建议对奕劻来说应该是有所影响的。奕劻会见朱尔典 4 天后，即 1911 年 12 月 28 日，隆裕太后召集王公大臣商议对策，袁世凯将问题推向近支王公们，最后王公集议的结果是召开国会商议政体，与朱尔典此建议如出一辙。
㊽《辛亥革命史料新编》，第 8 卷，第 176 页。
㊾《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料新编》，第 7 卷，第 249 页。
㊿《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13 页。
51《许宝蘅日记》，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1912 年 1 月 13 日），“上海来电，谓外国商团亦主张共和，有电与内阁及庆、醇二王”。《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内称时 1 月 12 日“上海西人商会电载沣、奕劻、袁世凯，请清廷退位。”
52据《辛亥革命首义史》统计得出。
53伍廷芳《伍廷芳集》，《致清庆邸书》，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69—370 页。
54见《许宝蘅日记》，十一月初二日“唐少川来电云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初四日“唐大臣来电仍主前日之说”；初八日“知唐少川来电仍以共和为词”，第 384—385 页。
55这是《许宝蘅日记》记载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为山西巡抚张锡銮电请承认共和。
56按《许宝蘅日记》，这份电奏内阁是在 27 日收到。《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参与这次联衔电奏的有：清第一军军统段祺瑞、提督姜桂题、张勋、副都统段芝贵、布政使倪嗣冲、陆军统制官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孟恩远、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参议官吴光新、曾毓隽、总参谋官徐树铮、陆军统领官鲍贵卿、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巡防统领王汝贤、赵倜等四十七人。
57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2 页。
58《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2 册，第 566 页。
59并非所有的亲贵都有此认识。当时记者采访恭亲王溥伟，溥伟指称各路统领所上要求逊位之奏系属捏造，仍热切希望继续开战，称“余知民军兵力不足，断难敌清军，设使清帝逊位，徒然贻我满人耻辱，以自显其怯弱而已。”见《溥伟之螳车中语》，载辛亥十二月十二日（1912 年 1 月 30 日）《申报》，第三版。
60有学者对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输捐做了专门研究，见王春林《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清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他认为亲贵们实际上是进行捐输，并且经过动员捐输的钱款数额高达 1000 多万。
61《辛亥年日记》，《绍英日记》，第 2 册，第 263 页。
62《辛亥年日记》，《绍英日记》，第 2 册，第 268 页。
63较之其他亲贵，奕劻前后捐输的十五万两银子数目算是较多的。其他亲贵大臣，如那桐的“爱国债实收纸”为“十一万二千八百元”，见《那桐日记》，下册，第 708 页。荣庆的“爱国捐”为“万元”，见《荣庆日记》，第 201 页。载泽捐“五千金”，乃“以行贿所得不能兑现之大清银行期票抵之”，大受恽毓鼎指责，见《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2 册，第 567 页。
64郑孝胥著，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3 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372 页。
65王春林认为亲贵捐输的反应似被放大，折射出当时各界对亲贵弄权、国事日非的痛恨，又夹杂了袁世凯集团与亲贵的矛盾纠葛，同时亦反映了清廷上层在鼎革之际的现实考量。见王春林《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清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由此观之，权贵们即便有所捐输，仍是舆论所指责的对象。
66《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12 页。
67《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2 册，第 567 页。
68《绍太保公年谱》，《绍英日记》，第 6 册，第 91 页。
69《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2 册，第 558 页。
70《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8 卷，第 100 页。
71《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 765 页。
72《绍太保公年谱》，《绍英日记》，第 6 册，第 91 页。
73《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13 页。
74《溥伟〈逊国御前会议日记〉》，第 172 页。
75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 1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8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